

《中国近代史》第二章第二节

作者: 张海鹏 发布时间: 2004-6-21 15:50:48

第二节 太平天国的政治社会主张

太平天国是一场带有浓郁的宗教理想色彩的农民革命,这在它的政治社会主张中也强烈地反映出来。

洪秀全早在宣扬敬拜上帝之初,就憧憬着建立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地上天国。他在《原道醒世训》一文中谴责了“世道乖离,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的社会弊端,明确提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不应存“此疆彼界之私”,不应起“尔吞我并之念”。金田起义之后,在以杨秀清、萧朝贵两人会衔的三篇起义文告中,也明确揭示出太平军起义的目的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解放被压迫的广大人民,“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扫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

在攻克南京并定都以后,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规划人们的社会生活。主要是强令蓄发变服,敬拜上帝;严分男行女行(将市内人民按性别各编成营);以及实行人无私财的圣库制度。除此而外,太平天国还极为严厉地禁止吸食鸦片黄烟、饮酒、嫖娼等恶习。这一切,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的,因而受到太平军内部贫苦农民出身的老兄弟、老姊妹们的热烈赞扬。李秀成即回忆道:“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将南京城内男女分别男行女行,百工亦是归行。愿随营者随营,不愿随营者各归民家。出城门去者,准手力拿,不准挑担。妇女亦由。男与女不得谈及,子母不得并言。严严整整,民心佩服。”然而这一系列措施,却使得具有多重社会经济职能的城市,蜕变为几乎只具单一军事职能的大兵营。城市的原有生活节奏遭到彻底的破坏。一些污泥浊水固然被荡涤了,但城市的生机也被扼杀了。

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太平天国根本不承认土地的私有,但又不可能象对天京等城市居民那样实行严格的管制,因而在一段时间里采取了“以下供上”的贡献代替“自上税下”的赋税政策。太平军在西征途中发布的“晓谕”曾明确向广大农民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天朝断不害尔生灵,索尔租税,尔等亦不得再交妖官之粮米”。这一措施,曾一度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当时一些地主士人的笔下,都出现过“一乡之人皆若狂”,“供献迎贼,所在如狂”之类的记载。

太平天国在推行上述政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社会改革方案。1853年12月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就是具有代表性的纲领性文件。文件全文虽仅三千字,内容却十分丰富,从田产均耕的土地制度、兵农合一的社会组织,直到宗教与教育、司法、选举与黜陟,等等,几乎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其核心为田产均耕的土地制度,全篇也因此而得名。《天朝田亩制度》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其要点是:“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凡男妇每一人自十六岁以上,受田多逾十五岁以下一半”;“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苧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

按人口平分土地是《天朝田亩制度》的菁华所在,并进而成为太平天国立国的一个重要原则。直到1854年6月东王杨秀清在答复英人质问时仍郑重声明:“田产均耕一事是也。人人皆是上帝所生,人人皆当同享天福,故所谓天下一家也。”但《天朝田亩制度》一方面抓住土地所有权不放,不愿土地成为农民的私产;另一方面抓住对分配的控制权不放,只许农民过“通天下皆一式”的生活,因而并没有能够起到指导革命运动的作用。也由于太平天国时期始终是战争时期,《天朝田亩制度》无法加以推行,它终于被束之高阁。

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平天国所推行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的消极方面愈益暴露。城市居民,尤其是天京居民对家庭和私有财产的破坏深感怨愤。他们的不满情绪为一些效忠清朝的敌对分子所煽动利用。1854年春,天京所发生的谋划打开神策门接应江南大营的事件,曾给太平天国领导人造成了极大的震动。但家庭和私有财产的恢复,直到圣库供给制难以继之之后才成为现实。太平军还在向南京进军途中,就以收缴、纳贡等各种方式获得了大量银米财物。在占领南京等城以后,接管的公私财物及仓储米谷更是不计其数。这是太平天国得以在天京推行圣库供给制的强大物质基础。然而上百万军民的浩繁开支不能不成为太平天国的沉重负担。以粮食供应为例。太平军在初入城时,对城内所有新老兄弟姊妹的粮食一律敞开开放,“来者即与之”。到了7月,“设立门牌,逐户编查”以后,“既有名数可稽,始议每日发米数”。到癸好三年年终(1854年1月)盘存,丰备仓、复成仓、贡院三处,屯贮谷127万担,米75万担,仅足支四个月口粮。1854年6月,“始下一概吃粥之令”。8、9月间终于出现断粮的紧急状态,城中大批男女被迫出城“割稻自食”,并多有借此而逃散的。

天京的粮食供应历来靠上游地区。太平军西征的首要目的即是采集粮食。然而太平天国所实行的由农村居民自愿贡献的政策却因没有法定的统一标准而给采供双方都带来了不便。到了1854年,除新占地区外,老区的贡献实际已无法进行。人们不愿主动进贡了。天京粮食供应的紧张迫使一些部队采取了强制征收的极端措施,这就激化了太平天国政权与当地人民的矛盾。甚至一些同情太平天国的人士也不赞成。如一位叫李汝昭的湖南士人在自己的记事中就说:“又看粤王声势,动辄掳掠为主,毫无王者之举动,全非霸者之经营。”

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是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而又体现统治阶级利益的有组织的力量。任何政府只有把各种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才能维护自己的统治。在取民政策上,太平天国只能回到既有的赋税制度。1854年夏初,东王杨秀清等正式向洪秀全要求准予“照旧交粮纳税”。洪秀全立即批准了这一奏议。“照旧交粮纳税”的重要性在于:它从承认既有的赋税制度出发,实际上也就承认了包

括地主在内私人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合法性。因而，随着田赋征收的走上轨道，关税、营业税等税收也相继得到了恢复。当然，照旧交粮纳税并不是要恢复横征暴敛的陋习。主持西征全局的石达开十分注意轻徭薄赋，因而逐步取得了江西、安徽等省人民的信任和拥护。1854年9、10月间，也就是江西、安徽等省正式实行照旧交粮纳税之时，杨秀清终于以天父下凡的形式，允许“一班小弟小妹团聚成家”。太平天国为此设立了婚娶官。原有室家者得以团圆。未经婚配的男女也得以建立家庭。城市的正常生活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太平天国从理想的天国退回到现实的人间，这是它在政治上开始逐渐成熟的表现，并因而取得了西征局势的好转和一破江南、江北大营的胜利。还是那位李汝昭，也终于改用赞赏的语气评论太平天国了：“是时武昌、南京属管之地，粤人出示安民，开科取士，禁头变服，按例征粮，农工商贾，各安其业，俨然有王者风。”

[下一节](#) [上一节](#) [返回目录](#)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回到顶部\]](#)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您是第位访客